

学习十九大精神
推动理论新变革

在新的时代复活中国文学传统

□张晓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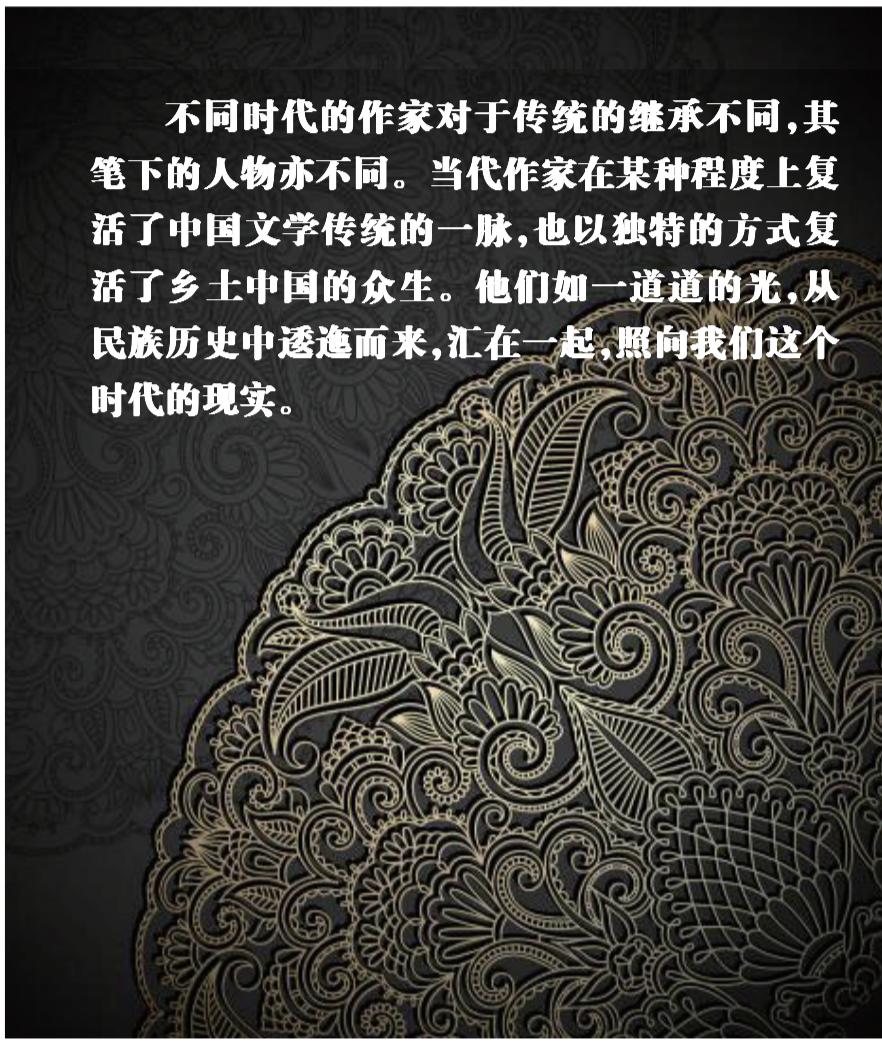
无论何种文学传统,都要通过作家独特的创新和转化方能产生新的意义。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假若传统或传递的惟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只有对传统的过去性和其在当下可能产生的意义有充分的意识,才有可能在新的时代复活传统,否则,只是一种陈词的重复。

中国当代作家面临的传统主要是自先秦至晚清的中国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时间上看,五四新文学传统离中国当代作家最近。由鲁迅开辟的乡土文学成为汉语新文学的重要传统,紧随其后的乡土小说流派对其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在鲁迅这里,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启蒙众生,他在那篇有名的《我怎么做罢,我仍抱着十多年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故而乡土的众生都是需要启蒙的对象,作家是精英立场的,是为了开启乡土民众的鸿蒙改良人生的。鲁迅笔下的故乡是阴郁的,是宗法制下压抑愚昧落后的存在,其中的人物大多是麻木的,没有自我意识,逆来顺受。乡土小说流派诸作家继承了鲁迅对乡土的批判,他们笔下的乡土一律是阴冷甚至是阴森的。他们写到冥婚,写到暗夜里偷偷拜天地的人,写到被宗法制夺取性命死前仍然没有自我意识的人,这与祥林嫂、闰土、阿Q是何等相似。以写湘西世界闻名文坛的沈从文与鲁迅不同,他的乡土是诗意的,如他本人所说,是供奉在希腊小庙里的人性。但是这人性是原始的,其启蒙更多来自自然,比如《边城》中的翠翠的生命与精神都是受了山水的滋养。

十七年期间,乡土在革命文学传统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乡土变为农村,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乡土中的人物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比如《创业史》,柳青认为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小说原本着力塑造的是梁生宝,但正如严家炎先生指出的,这个人物有“三多三不足”的缺憾。相比之下,梁三老汉却成了一个喧宾夺主的人。他在睡梦中笑出声,梦见自己成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这样卑微的梦想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中国梦。他的身上显现出农民身上更真实也更多元的一面。

五四新文学也好,革命文学也好,这些乡土世界的人物都是作家在乡土之外的眼光审视的。站在乡土,或者说立足民间的乡土是何种情形?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是何种面貌?他们是否仍然麻木不仁,或者生活中只有斗争?最早呈现出与以上两种传统不同的是赵树理,他时刻想的是“自己供给的精神食粮群众能不能吃进去”。赵树理希望自己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里的“起作用”,重要的含义是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小说传递民间的声音。比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所谓“中间人物”的声音也是当时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心

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传统的继承不同,其笔下的人物亦不同。当代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脉,也以独特的方式复活了乡土中国的众生。他们如一道道的光,从民族历史中透迤而来,汇在一起,照向我们这个时代现实。



那一亩六分地。这仿佛是一个隐喻,莫言的文学之根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高密东北乡。然而,土地之上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给莫言的创作同样带来变化。莫言本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的。”正因为这一点,莫言笔下的乡土众生都是真实的,他们拥有不完满的自我,却又是丰满的。他们哪怕是拥有人性的永恒弱点,却也是有自我意识,有反抗的。甚至,他们的反抗往往不局限于乡土世界的方式,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马,他在反抗时常想起于连,他的反抗也带有于连式反抗的特征。这似乎突破了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民众的惯常理解。事实是,中国农民形象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本身会发生变化。只有一个扎根于土地的作家才能看到土地之上众生的变化,也正因此,一个作家才有可能持续创作。于是乎,我们在莫言的新作中看到了新鲜复杂的乡土众生:一个近乎于阿Q的弱者武功,几乎是一无所有,但又有凶残的一面,以睚眦必报的方式对抗世界;一个同样热爱土地但又清醒地看到自己祖辈缺点的青年孙来雨;一个优缺点同样明显的村官张二昆……他们都是莫言在土地上复活起来的众生,他们拥有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把他们的欢喜幸福、委屈无奈,甚至是他们被损害的悲愤和盘托出了。

这样做的并非仅仅莫言,许多作家作品中都出现了貌似不同以往的农民形象。早在10年前,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甫一问世就遭到了质疑,其中的女主角繁花是个村干部,一心为村民谋福利,然而,当她努力工作时,却被人最信任的人在背后捅了一刀。论者质疑的是她丰富的精神世界,甚至有人认为繁花的精神性不像农民,太小资。现在,这种质疑声渐渐弱了下来,因为更多的新的农民形象正在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是“70后”作家梁鸿的《梁光正的光》中的父亲梁光正。李敬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农民,他是圣徒,他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梁光正与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形象完全不同,他有很不卫生的一面,就是随地吐痰;但他又有让人不可思议的一面,身为一个农民,他永远穿着雪白如一道光的白衬衫,这两个细节似乎构成了一个矛盾体,却又是如此贴切地糅合在一个新的农民身上。他固执保守,甚至是偏执,但又渴望融入这个时代,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他的身上同时呈现出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和复杂性。所以,在现当代文学的农民形象谱系中,梁光正完全是个“新人”。他终其一生都在寻亲,却永远找不到真正的亲人,“寻亲”也可以理解为梁鸿为梁光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物中的“寻亲”,他拥有此前农民形象的基因,但更多的是变异。

毫无疑问,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传统的继承不同,其笔下的人物亦不同。当代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脉,也以独特的方式复活了乡土中国的众生。他们如一道道的光,从民族历史中透迤而来,汇在一起,照向我们这个时代现实。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常常呈现为“平衡—失衡—再平衡”的过程。所谓“失衡”一般指一个民族的语言在受到外来语言影响时,它在词汇、语法方面总会有比较大的改变,出现“新”与“旧”杂糅;随后它会在旧的基础上吸收新的、外来的词汇与语法,实现“新”与“旧”的融合,从而达到“再平衡”。汉语在近现代史上的变革其实也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出现颠覆了旧的语言格局,它经历的是从“平衡”到“失衡”,而它以传统汉语为基础吸收欧化语、文言与方言的成分逐渐走向成熟,就是从“失衡”走向“再平衡”。以往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学语言问题已经做了较多研究,但此前对文学史中的语言运动与论争,以及作家个人语言风格研究比较多,而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发展的整体研究相对较少。

张卫中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整体研究,2013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最近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这两部著作的不同在于,前书的重点是描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变迁的线索,关注文学语言与时代变革的关系,描述时代变革对作家的影响,以及每一个时代文学语言呈现的总体特点。本书则更致力于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以文学语言的发生发展为中心,观察语言与文学的互动,观察不同时期文学语言建设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以及对文学建设产生的影响。该书的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

从作家个人语言变革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的过程。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

五四作家虽然是大致同时开始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但每个人的转变都是特殊的,这个转变有不同的背景与方式,不同的语言背景也会在他们使用的白话文中打下特殊印记。作者认为,现代白话其实是用西文的思维模式对传统白话改造的结果,因而,五四之前,新文学作家大都有一个准备过程,他们通过学习西语或大量阅读西文著作先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真正掌握现代白话文的特点。例如,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学过英语,在矿路学堂学了德语,到日本后在学习日语的同时,又继续学习了德语;除了学习外,他还翻译了《月界旅行》《海底旅行》,以及短篇小说《漫》《默》《四日》。在对西文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他的思维方式明显受到西文的影响,而当他把这种思维方式用之于白话文,用西文的思维模式对旧白话进行改造以后,就率先创造了具有现代特点的白话文,在“五四”以后他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文言到现代白话文的转型。

从语言与文学的互动角度观照中国文学语言的建设与发展。在新文学史上,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例如,1930年代新文学在题材和体裁上都有很大的拓展,体裁多元化,反映的生活也更加多样化。而现代白话对这个时期的作家来说还是一种较新的工具,当他们用广角镜反映生活时,就有必要让语言有一个“跟进”,其中每一步都要经历大量的实验与探索。例如在中长篇小说创作中要用现代白话做大量的心理描写对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就是一个新的课题,他们必须用更复杂的句子、更为多样的词汇描写现代人变幻不定的心理活动。经过多年的探索,20世纪30年代作家进一步提高了新式白话的素质;在文学题材和体裁的扩容中,拓展了新式白话的疆域,也进一步展现了它的长于叙述精密复杂之事,描写变幻多样心理活动的长处。

从整体上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历程,注重考察不同时期语言建设遇到的主要问题,关注语言建设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作者认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经历了一场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其后,它在语言建设上面临着繁杂多样的任务。但是,五四以后,文学语言的建设并不是平面地铺开,而是体现了轻重缓急。在现代文学30年中,新文学作家最初着手解决的是汉语书面语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一方面他们要借鉴、吸收翻译语体、文言与方言中的有益成分,提高现代文学语言的表现力,但他们同时又要克服过分欧化、过多使用文言与方言而导致的语言混杂。到了新时期,中国作家在解决了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后,才有条件致力于解决由语言变革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文言到白话变革带来的汉语诗性被淡化的现象。在新时期很多作家都致力于中国文学语言诗性的建设,努力在现代汉语基础上再造中国文学语言诗性的辉煌。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张卫中虽然作出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有待拓展的空间还是很大,作者虽然搭建了一个整体框架,也探讨了其中的重要问题,但他主要还是勾勒了一个线索,如果能够将整体线索与每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联系起来,这项研究就可以更为丰厚详实,展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生与流变的真实面貌。

——评张卫中《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生与流变》

□王力



《长江文艺》原创第2期

小说坊 中篇

- 长脖子老等 | 吕志青
- 口红与猫 | 张映勤
- 短篇
- 夫妇 | 陶丽群
- 风和破碎的阳光 | 姜东霞
- 婚房 | 谷凡
- 大故宫 | 王者之城 | 祝勇
- 笔记本 | 大沙河 | 谢伦
- 看古巴 | 大困境 | 埃米利奥·科斯马·帕雷特
- 青铜甲壳虫 | 玛格丽塔·桑切斯·加伊纳尔
- 酒吧里的科赫菌 | 拉法埃尔德·阿吉拉·博尔赫斯
- 冬日为时尚早 | 安娜·玛丽娅·拉达艾里
- 儿子的问题 | 艾瑞克·弗洛雷斯·泰勒
- 何塞·克塞尔的诗(2首) | 何塞·克塞尔
- 诗空间 亚高原(6首) | 沈苇
- 安静的果子(14首) | 余真
- 颂辞(12首) | 杨光
- 三官殿 大漆: 鲜活的现在进行时 | 曾静
- 刊中刊 骑龙人物 | 胡泽光
- 翠柳街 浮世三千, 不过空相而已 | 丁东亚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第2期

自在说 北方于我 | 叶舟

再发现 伊帕尔汗 | 叶舟

那一番美好的颤栗 | 叶舟

——关于《伊帕尔汗》(创作谈)

好看台 中篇

大河 | 邵丽

钛钢时段 | 杨少衡

晚餐 | 川妮

短篇

一夕 | 吕新

宗师的死亡方式 | 马笑泉

天子 | 周李立

推手推 长夜 | 陈年

江湖汇 世界第一等恋人 | 杜梨

再回首 静翕: 李峰、张广慧、陈勇作品展 | 傅中望

翠柳街 叙述圈套背后的终极表达 | 喻向午

地址: 武汉市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 电话: 027-68880620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37/1

邮发代号: 原创 38-6 选刊 38-411

主办单位:
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好 看

我的1997 杨胜应

没有诗的远方(简评) 南志刚

小 说

头条 别信 扎西才让

鱼乐火刺疑事 沈念

没有关闭的两扇门 冯积岐

对癫痫患者要有耐心 魏思孝

十字坡 黄跃华

哈喽,安东尼奥 范平

四顾苍茫(组诗) 石人

和风吹送(组诗) 徐必常

勿忘我(组诗) 高堂东溶

燕子飞临(组诗) 方其军

逢源(组诗) 应诗虔

就像岛屿对海洋的眷恋(组诗) 舟子

内心的风景(组诗) 陈广德

文学港

2018年
第1期目录
总第230期

明亮(组诗) 赵丽兰

蜕变(组诗) 赵幼幼

译诗: 德斯诺斯诗选 董维平译

散 文

在场 师父 沈建基

虚掩之门 许亚云

伊犁行记 俞贊江

寻梦九寨 彭素虹

世间情动(外一题) 彭雪

江南听雨(外一题) 孙玉安

甬城笔记专栏

大里黄公的户籍问题(下篇) 柯平

评 论

名家刊评 沉重的肉身 马兵

甬上作家 一种视角生成的文本: 结构方式

和叙述风格 谢志强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青烟(小说) 董喜萍

向死而生(散文) 蒋静波

西湖

2018年第三期目录

新锐 路魆小说二题

内详 李黎

告密者 钱墨痕

雪淹没了许多 修新羽

骷髅梅花 黄亚明

余怒的诗 余怒

于艾君的诗 于艾君

穿越透明的玻璃窗, 与世界迎

面相撞 张玲玲

要漂亮, 要写作 西维

史诗性、知识分子与战争的沉思 王春林

——关于科幻文学的讨论(下)

..... 杨庆祥

——栏目主持: 杨庆祥

——与理查德·德米尼奇的对谈(下)

..... 采访、翻译: 曾不容